

丝绸之路与中国西域安全*

——兼论中亚地区力量崛起的历史条件、规律及其因应战略

张文木

【内容提要】 通往西域的丝绸之路以天山为界分南北两线。以喀什为外联枢纽的南疆线是西域稳定的关键线路。与北疆线地缘政治特点不同,此线不利于国家军事力量大规模机动,在历史上多是境外势力渗透并资助中国西域分裂势力的关键通道。欧亚大陆可容纳的古今战略力量,大体分欧洲、中亚和中国三部分,其两端若有任何一方衰落并由此造成战略力量的收缩,都会引发中亚战略力量在欧亚结合部即中亚地区的崛起和扩张。这样的变局一旦出现,它对中国西陲安全造成的压力当然是全方位的。目前,中国西域地缘政治环境在机遇和挑战两方面都有了向汉唐形势回归的趋势,8世纪出现在中国西陲的“大食”形势再次向中国西陲逼近,地区恐怖主义为争夺这个战略真空并由此对中国西陲造成的安全压力和危险必将同比增大。当前中国西域恐怖分裂主义事件日益向南疆喀什一线汇集的事实表明,它们已不是互不联系的偶发事件,而是有着在历史上被新疆分裂主义势力规律性地多次重复过的地缘战略取向。为了间离中俄关系,日本在诱导中国西进中亚,而东海则是中国安全的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中国须未雨绸缪。

【关键词】 丝绸之路;西域安全;地缘政治;西亚战略;国家安全

【作者简介】 张文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战略问题研究中心研究员。(北京 邮编:100091)

【中图分类号】 D81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9550(2014)03-0004-24

* 感谢《世界经济与政治》杂志匿名评审专家提出的修改意见和建议。文中错漏由笔者负责。

一 概念及其界定

“西域”是中国史籍使用的一个地理概念,泛指玉门关、阳关以西的广大地区。尽管各史所记“西域”的范围大小不一,其核心部分均为包括中国新疆在内的中亚地区。^①新疆是中国西向开放及陆上“丝绸之路”的主要出口,因此,本文所说的“西域安全”就是与丝绸之路相关的中国西北地区,具体说是甘肃、新疆的安全及影响中国西陲的安全因素。

中国历史上的对外开放和交流分西东两部分,“丝绸之路”可分为“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唐朝及此之前,中国对外开放主要以西部的陆上丝绸之路为主要出口。当时以长安为起点,经河西走廊至敦煌、哈密沿天山分叉为北南两路进入哈尔福德·麦金德(Halford J. Mackinder)所说的世界地缘政治的“中枢地带”即欧亚大陆结合部的中亚地区,沿黑海北南两岸进入欧洲。隋之后,中国对外开放的线路由西折东,改为以洛阳继而北京为起点,北出山海关入朝鲜半岛,南下天津、连云港、上海等口岸进入东南亚。本文重点分析陆上丝绸之路对中国西域安全的影响。

二 中国西域地缘政治特点及其稳定的关节点

在海路尚未开通之前,对中国安全影响最大的是西线丝绸之路,出河西走廊以后,进入中亚的线路依天山分为北疆和南疆两线。北路西端有阿拉山口和伊犁河道等,在南疆西端则有别迭里山口、乌孜别里山口、瓦罕走廊和喀喇昆仑山口等。经过这些通道,便产生了中国与中亚、南亚、小亚细亚乃至欧洲的交流。

西线的北南两疆的线路因其地形和位势不同,对中国安全产生的影响也不尽相同。位于北疆的丝绸之路地势东高西低,由西入疆困难而东出容易。阿拉山口和伊犁河道是其西出的重要通道。从这里出去就是一马平川的西西伯利亚继而东欧大平原,它是中国古代游牧势力(比如公元5世纪和13世纪的匈奴人和蒙古人)进入中亚和欧洲的最方便因而而是主要的通道。1931年,时任日本陆军步兵大佐、后任陆军大臣的板垣征四郎(Seisirou Itagaki)考察后认为:“伊犁河流域这块地方

^① 余太山主编:《西域通史》,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前言”,第1页。

在战略上极为重要,因为这就是早期俄国多次入侵军队所必经的‘各民族的大门’;①“自古以来,伊犁地方当西方交通之要冲,阿拉伯和印度等文明都是从这里进入中国的”。②

丝绸之路的南疆线路沿塔里木盆地北南两线分为北道和南道,以帕米尔高原为西界,其地势西高东低,从西入疆容易而从东出疆却十分困难——此与北疆线路正好相反。当年张骞一行就是从沿天山南麓、塔里木盆地的北道,过库车、疏勒(今新疆喀什)等地,翻越葱岭,至大宛(今乌兹别克斯坦费尔干纳盆地)、康居(今乌兹别克斯坦和塔吉克斯坦境内),后顺东帕米尔高原南下,经大月氏(阿姆河北岸)至大夏的蓝氏城(阿富汗喀布尔西北的瓦齐拉巴德)。继而东折重越葱岭后,改行沿塔里木盆地的南道,从莎车(今属喀什地区),经于阗(今和田)、鄯善(今若羌),经河西走廊最终返回长安。

帕米尔高原由几组山脉和山脉之间宽阔的谷地和盆地构成,分东、中、西三部分,东帕米尔是帕米尔高原海拔最高的部分,地形较开阔坦荡。沿中国西陲南下的别迭里山口、乌孜别里山口、瓦罕走廊及喀喇昆仑山口等都是由南疆线进入东帕米尔的重要出口。

帕米尔高原是东西之间来往交流的必经之路。南疆北南两道汇合至喀什地区后进入帕米尔高原,沿葱岭古道直达位于塔什库尔干的石头城。从那里起,又分南北两道,一线西向经伊朗、叙利亚到土耳其至欧洲,另一线南下至印度次大陆北部。这样,塔什库尔干——西北与塔吉克斯坦、西南与阿富汗接壤,南与巴基斯坦相连,东与叶城和莎车、北面与阿克陶县相连——就成了南疆线进入中亚的关键通道,而喀什地区则是扼住由南疆西北进入费尔干纳盆地、西南进入塔什库尔干、继而瓦罕走廊的咽喉地带,其东北方向的阿克苏则是控制整个南疆的战略枢纽。

与中国境内塔什库尔干接壤的阿富汗地处帕米尔高原和伊朗高原间的高原宽谷地区,是影响中国西陲稳定的关键邻国;瓦罕走廊是沟通中国和中亚国家交流的要路,中阿两国在狭长的瓦罕走廊东端相毗邻,边界线只有 92 公里。瓦罕走廊海拔 4923 米,属于高寒山区,一年之中有数月大雪封关,其道路异常艰险。③

① 巴巴拉·杰拉维奇著,福建师范大学外语系编译室译:《俄国外交政策的一世纪》,北京:商务印书馆 1978 年版,第 143 页。

② 坂垣征四郎:《从军事上所见到的满蒙(1931 年 3 月)》,载复旦大学历史系日本组编:《日本帝国主义对外侵略史料选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5 年版,第 4 页。

③ 可参见当地采访报道:《专家:瓦罕走廊关系到中国的整体安全战略》,http://news.qq.com/a/20091228/001222.htm,登录时间:2009 年 12 月 28 日。

沿丝绸之路的南疆线向西进入帕米尔高原,经兴都库什山过伊朗高原直至叙利亚。与北疆线正好相反,南疆线西高险而东低缓的地形使其在历史中多是进入中亚的西方力量——比如古代的亚历山大、罗马、十字军,近代拿破仑法国、英国,甚至还有今天的美国——从最西端的叙利亚,影响中国的传统通道。这一条线路上的伊拉克、伊朗、阿富汗都是西方人切入和控制南线丝绸之路的关键地带,而目前发生在叙利亚的冲突则是当年古罗马东进并因此与安息帝国在此发生战争的重演。从这个视角看,唇亡齿寒,伊朗高原乃至帕米尔高原一带自古迄今抵抗西方的斗争对于中国西陲安全具有重大的战略价值。

丝绸之路的北疆线东高西低,较南疆相对平缓开阔,有利于军事作战力量的大规模部署和机动,这使得它成了纵横于蒙古高原的东方游牧民族大规模西进的线路,当然也是历代中原王朝治疆政策较容易推行的线路。俄国近代崛起并东扩后,蒙古高原的西进势力和中亚伊斯兰势力在俄国的挤压下日渐式微,东北大平原上女真势力被迫聚合南下。中国西北安全由汉时的匈奴问题、唐时的伊斯兰问题,至17-18世纪时已大规模地转变为俄罗斯问题。^①

正因其地缘政治位势的关联性,中国西域的稳定既关联中原,又关联中亚乃至欧洲。民国著名历史学家朱希祖指出:“西域一地,在吾国常人视之,以为边疆,无足轻重;而以亚洲全局观之,实为中枢。蒙古统一亚洲,先经营西域,迨二区在握,而后西征弗庭,前后左右,鞭笞裕如,其明证也。故欲统一亚洲者,蒙古西域,首为兵事必争之地,欧亚强国,苟欲争霸亚洲,此二处必为最要之战场;然蒙古不过为甲乙二国最初决定胜负之区,而欲控制全亚,与其他各国用兵,必以西域为最要地矣。吾国新疆为西域最要区域,吾国得之,足以保障中原,控制蒙古;俄国得之,可以东取中国,南略印度;英国得之,可以囊括中亚细亚,纵断西伯利亚,故在昔英俄二国,已各视此为禁脔。”^②

沙俄和苏联时期,中亚受俄罗斯人控制并成为俄罗斯人进入印度洋的战略通道,陆上丝绸之路也因此受阻。苏联解体后,中亚诸国与俄罗斯和中国共同成立了上海合作组织(SCO),这条通道对中国再次开放。2011年,起始于中国重庆经新疆出阿拉山口至德国杜伊斯堡的渝新欧国际大通道全程开通,全程经过6个国家,运行里程达

① 18世纪初,彼得一世实行了一系列改革,使俄国国力壮大,跻身欧洲强国行列。1721年,彼得一世宣布俄为帝国。叶卡捷琳娜二世时期,俄领土空前膨胀,被称为“帝国的黄金时期”。此间俄国边界已扩张至中国西北。参见张芝联、刘学荣主编:《世界历史地图集·1598-1800年向东扩张》,北京:中国地图出版社2002年版,第82页。

② 朱希祖:“序言”,载曾问吾:《中国经营西域史》,北京: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1页。

10300公里,运行时间约13天,比原运行最多时间39天减少2/3。渝新欧线路的贯通反映了中国西北地缘政治环境有了向汉唐形势回归的趋势。

但这种回归带来的不仅是汉唐机遇,更是汉唐必须独立应对的安全压力。罗马力量尚未东扩时,中国汉朝必须独立应对近乎覆盖整个蒙古高原的匈奴等部落群的安全压力;两汉倾其国力将匈奴赶上西迁之路,由此造成西罗马帝国的解体及欧洲力量从中东退缩。欧洲退出造成伊斯兰力量在中东的兴起和扩张,这又迫使唐朝必须独立应对大食^①帝国东扩的压力。现在回头来看,唐帝国将直接控制的西陲边界推至帕米尔高原西麓即今塔什干(今乌兹别克斯坦首都)一线,实在不是值得羡慕的荣耀而是超出国力极限的无奈之举。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战略力量从中亚收缩及近期美军从阿富汗完成撤军留出的战略真空,将使伊斯兰国家及在抗美入侵中新崛起的政治力量自唐朝之后再次在中亚集结,8世纪出现在中国西陲的“黑衣大食”^②形势再次东向中国进逼。

三 稳定西北的战略线

(一) 历史经验

带有规律性的历史经验表明,东帕米尔高原是影响中国西陲安全的战略制高点——唐朝高仙芝就是通过率先控制这个制高点,才成功反制了大食的东扩并由此使唐朝西陲获得近一个世纪的相对稳定,^③这从西北方向大大减轻了安史之乱期间国家遭到的破坏。从唐之后的历史经验看,如果不能控制帕米尔高原,那么扼住中国境内的喀什地区,也就扼住了中国西域反分裂斗争成败的关键地带。

需要说明的是,本文中的“喀什”更多的是地缘政治而非纯地理的概念。它包括以下三部分内容:(1)喀什地区;(2)以喀什为龙头,以和田、阿克苏两区为侧应的西南疆地区;(3)以喀什为龙头的丝绸之路南疆线。在此概念的基础上,下列历史经验值得研究。

1. 班超出使西域平乱

公元16年(天凤三年),王莽派往西域的平叛军队为焉耆(今新疆焉耆)、姑墨(今新疆温宿、阿克苏一带)等国叛军击败,西域诸国由此完全断绝了与中原政权的联系,

① 大食,中国唐、宋时期对阿拉伯人、阿拉伯帝国的专称和对伊朗语地区穆斯林的泛称。

② 即大食国最强盛时期的阿拔斯王朝(公元750-1258年)。因其旗帜尚黑,故中国史籍称其为“黑衣大食”。

③ 参见谭其骧主编:《简明中国历史地图集》,北京:中国地图出版社1991年版,第41-44页。

公开与新莽王朝分裂的匈奴单于便趁机在西域扩充势力。

东汉初,收复西域问题再次提上议程。公元73年(汉明帝永平十六年),班超等人从玉门向西域进发,于当年收复于阗,次年春平定疏勒国。公元75年(汉明帝永平十八年),汉明帝去世。焉耆国乘汉王朝大丧之机,围攻西域都护,班超孤立无援,而龟兹、姑墨等国也屡屡发兵,进攻疏勒。班超在盘橐与疏勒互为犄角,首尾呼应,坚守了一年多。公元78年(汉章帝建初三年),班超率兵攻占姑墨,孤立了龟兹。公元89年(汉和帝永元元年),班超率兵从位于喀什与于阗之间的莎车突破,迫使莎车国投降,由此打通疏勒至于阗一线并使之形成合力,这对位于东北方向的龟兹、姑墨等国形成巨大的威慑,龟兹王因此远遁。公元90年(汉和帝永元二年)夏,大月氏出兵七万,东越葱岭,从背面攻打班超。班超坚守,大月氏进退无据,遣使向班超请罪,遂与汉朝和好。班超由此威震西域。公元91年(汉和帝永元三年),龟兹、姑墨、温宿等国皆降。朝廷任命班超为都护。公元94年(汉和帝永元六年)秋,班超调发龟兹、鄯善等八国的部队七万人进攻焉耆、危须(位今焉耆回族自治县东北)、尉犁(今新疆巴州尉犁县)。至公元94年,三地归附。此后,西域五十多个国家纷纷归附了东汉王朝。

2. 高仙芝平息小勃律反叛和抗击大食东扩

公元476年,西罗马帝国灭亡,欧洲大陆陷入内乱,其战略边界大幅向西退缩。中东地区由此出现巨大的战略真空地带,这为伊斯兰运动于公元7世纪上半叶在阿拉伯半岛兴起并迅速向四周扩张提供了有利条件。至公元750年,阿拉伯帝国的边界已与中国西陲接壤^①并严重影响中国西陲安全。

位于今克什米尔西北部的唐属国小勃律,都城孽多城(今吉尔吉特),此地亦是吐蕃通往安西四镇的交通要道。公元8世纪40年代初,吐蕃赞普把公主嫁给小勃律王苏失利之为妻,小勃律遂归附于吐蕃,吐蕃进而控制了西北各国,并迫使其中断对唐朝的朝贡。唐几任安西节度使均派兵讨伐,因地势险要,加之吐蕃进行援助,皆无功而返。

公元747年(唐天宝六年)春,唐玄宗下制,以安西副都护、都知兵马使、四镇节度副使高仙芝为行营节度使,率万人部队由安西西征,沿南疆路线经拨换城(今新疆阿克苏)、握瑟德(今新疆巴楚)、疏勒,随后挥师南下西入葱岭,从瓦罕走廊突破,抄小勃律后路,一举平息了小勃律的分裂活动。由此,“拂菻(古罗马——笔者注)、大食诸胡

^① 参见张芝联、刘学荣主编:《世界历史地图集·1598-1800年向东扩张》,第52页。

七十二国皆震慑降附”。^① 随后高仙芝又一路北上,将伊斯兰阿拔斯王朝(即黑衣大食)东进扩张势力抵挡在怛逻斯(今哈萨克斯坦南部塔拉兹附近)即东经 68° 一线。此后,“唐朝的影响主要限于锡尔河以北的地区,而大食帝国也没有乘胜东进”。^②

3. 噶尔丹叛乱

1670 年(清康熙九年),噶尔丹兄长僧格在准噶尔贵族内讧中被杀;次年,噶尔丹自西藏返回,击败政敌。1677 年(清康熙十六年),噶尔丹俘获其叔父楚琥布乌巴什,次年击败和硕特部首领鄂齐尔图汗,遂统一漠西蒙古各部。1679 年(清康熙十八年),达赖喇嘛赠噶尔丹博硕克图汗称号并授意他先就近建立根据地,然后向远扩张的“近攻计”。据清代地缘政治学者梁份书载:“是时诸夏有滇、黔变,秦、蜀间蜂起,嘎尔旦(噶尔丹——笔者注)谋所向。达赖喇嘛使高僧语之曰:‘非时!非时!不可为。’嘎尔旦乃止,其谋臣曰:‘立国有根本,攻取有先后,不可紊也。李克用之先世,发迹金山,根本不立,遂不能成大事。我太祖(指元太祖铁木真成吉思汗——笔者注)初兴,灭国四十,奄有四方,然后促夏执金,混一称尊。’嘎尔旦善其言,乃为近攻计。”^③达赖派的“高僧”以发迹于新疆东北大漠的李克用霸业失败为教训告诉噶尔丹:北疆不是成事之地,而“为近攻”即在南疆建立根据地,有了这个“立国之根本”后再向四周扩张,才是“奄有四方”的上策。

从后来噶尔丹的用兵路线看,以喀什为重心的南疆地区成了他“为近攻”的首选。1680 年(清康熙十九年),噶尔丹应达赖喇嘛之请,派兵帮助天山南路伊斯兰教“白山派”首领阿帕克和卓与“黑山派”争斗,乘机夺占南疆地区。噶尔丹率兵经阿克苏、乌什等地进攻并夺下喀什噶尔(今新疆喀什)和叶尔羌(今莎车一带)。控制南疆地区后,噶尔丹遂将兵锋转向漠北。1688 年(清康熙二十七年),噶尔丹进攻喀尔喀蒙古土谢图汗部,继而进军内蒙古乌朱穆秦地区,威逼北京。康熙帝三次亲征,1690 年(清康熙二十九年)乌兰布通之战后,噶尔丹败退至科布多。1696 年(清康熙三十五年)昭莫多(今内蒙古肯特山南)之战,噶尔丹主力军被清军击溃,部众叛离。1697 年(清康熙三十六年)春,噶尔丹死于科布多。

4. 张格尔叛乱

19 世纪初,喀什成了张格尔叛乱的集中爆发地。张格尔在浩罕国支持下,潜入南

① 《新唐书》卷一百三十五《高仙芝传》,载许嘉璐主编:《二十四史全译·新唐书》(第六册),北京:汉语大词典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3193 页。

② 余太山主编:《西域通史》,第 191 页。

③ [清]梁份:《秦边纪略》,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421 页。

疆发动叛乱。叛乱从1820年(清嘉庆二十五年)始至1828年(清道光八年)结束,前后为祸南疆近十年,1826年(清道光六年)祸乱规模达到巅峰。是年张格尔率五百余人,窜回喀什噶尔地区,利用南疆的反清情绪及其宗教影响,集众万余人发动叛乱,先后攻占喀什噶尔、英吉沙尔(今英吉沙)、叶尔羌、和阗(今和田)等城,自称赛义德·张格尔苏丹。清政府命伊犁将军长龄调集吉林、黑龙江、陕西、甘肃、四川清军万余人,会师于阿克苏,组织全面进攻,相继收复喀什噶尔等地。1828年年初,张格尔被清军擒获,解至北京处死,叛乱平定。但由于地形复杂,平叛的代价是巨大的,清政府“是役用兵三万六千,用帑银一千余万两”,^①其用最费在喀什。

5. 阿古柏叛乱

鸦片战争后,清祚日衰。同治年间,新疆出现大规模反清运动。1864年在库车、和阗、喀什、吐鲁番等地先后出现数个割据政权。占据喀什旧城的柯尔克孜伯克^②司迪克自立为“帕夏”,为了树立威信,决定去浩罕城迎回大和卓曾孙,号称“圣裔”的张格尔之子布素鲁克,立其为傀儡。1865年春,浩罕摄政王阿力木库尔汗派阿古柏率骑兵护送布素鲁克去喀什并在喀什组织叛乱,将司迪克逐出新疆。1867年,阿古柏自称“洪福之王”,在南疆建立了包括喀什、英吉沙、叶尔羌、和阗、阿克苏、库车、乌什等七城的“哲德沙尔国”。1870年,阿古柏占领吐鲁番和乌鲁木齐,势力扩展到北疆。为了得到外国势力的援助,阿古柏与俄国和英国分别于1872年、1874年签订了非法的《俄阿条约》和《英阿条约》。阿古柏出卖中国主权利益并由此得到大批英国先进装备后,势力迅速扩展至整个新疆,为祸新疆十余年。1876年秋,左宗棠大军先收复南疆东四城:焉耆、库车、阿克苏、乌什;接着收复西四城:喀什、英吉沙尔、叶尔羌与和阗。阿古柏败亡,其长子胡里与白彦虎逃往俄国。同年,俄国吞并浩罕。此后,俄英两国在新疆地区发展各自的势力,先后在新疆开设总领事馆,地点就选设在阿古柏叛乱的大本营——喀什。

综上时跨近两千年中在新疆发生的分裂与反分裂较量的著名事件,我们可以看出,尽管其形式不同,然其“成也喀什、败也喀什”的特点却惊人地相似。中国西域问题专家曾问吾一语道破天机:“我国无帕米尔,则无疏勒(今喀什);无疏勒,则无新疆;牵一发足以动全身,足见其地关系边防之大!”^③

① 曾问吾:《中国经营西域史》,第303页。

② 伯克,在当时伊斯兰国度中相当于“王公”,低于可世袭的君主“汗”。参见包罗杰:《阿古柏伯克传》,北京:商务印书馆1976年版,第178-179页。

③ 曾问吾:《中国经营西域史》,第448页。

(二) 喀什:影响中国西域安全的关键地区

但是,帕米尔高原在中国历代治疆实践中总体上说还是国力不逮的地域。与当年苏联在阿富汗失败的原因一样,其难不在远而在险。唐僧玄奘西行至阿克苏地区就有了“经途险阻,寒风惨烈。多暴龙难,陵犯行人。由北路者,不得赭衣持瓠,大声叫唤,微有违犯,灾祸目睹。暴风奋发,飞沙雨石,遇者丧没,难以全生”^①的记载。时隔一千多年后的今天,即使掌握军事高科技的美军在阿富汗山地也有“十辆坦克也比不上一头驴”^②的感叹。如从实战的视角观察,西南疆路途的艰险程度可能与阿富汗比好不了多少。路途之险,再加上喀什西接帕米尔高原、东通河西的地理位置,使其在南疆安全中居于极为关键的地位。

历代治疆经验表明:治疆之要在南疆,为此唐朝治疆以安西都护府为重点;南疆之要在喀什,为此唐朝以疏勒为龙头专设“安西四镇”。疏勒地处欧亚大陆中部,是丝绸之路上的商埠重镇和进入中亚的重要交通枢纽。西汉时,疏勒国“西当大月氏、大宛、康居之道”,^③与今塔吉克斯坦、阿富汗、巴基斯坦接壤。由此越上帕米尔高原转西便进入伊朗高原,继而进入叙利亚并直抵欧洲。与东高西低且可直入西西伯利亚大平原的北疆路线相比,以喀什为枢纽的西南疆线更加崎岖曲折,西高东低,地高天寒,不利于大部队机动,这一地理特点使喀什地区势力比南疆其他地区更容易得到境外资助并因此坐大。凡能坐大,必有外援;凡有外援,必有通道。与南疆其他地区比较,喀什最符合这一条件。鉴于此,唐高仙芝在平息小勃律分裂叛乱后,并没有回撤而是继续西进至帕米尔高原西麓,彻底截断了境外势力对中国西域反叛势力进行资助和渗透的通道。

如前所述,帕米尔高原是影响中国西陲安全的战略制高点。唐朝高仙芝的成功说明,控制帕米尔高原这个制高点是控制中国西陲甚至是控制整个中亚的关键环节。明乎此,也就明白了阿富汗在历史上何以成为英、俄、美等世界霸权国家的必争之地。

但这只是问题的一方面。从另一方面看,控制帕米尔高原,对唐王朝而言,已是超出其国力因而是不得已的做法。法国历史学家勒内·格鲁塞(Rene Grousset)在肯定高仙芝靖边行动的成绩的同时也婉转地指出这一“短板”：“高仙芝对帕米尔以西的两次战役,标志着唐朝中国在中亚的扩张达到了顶点。此时,中国已经成为塔里木地区、

① [唐]玄奘、辩机著,季羨林等注释:《大唐西域记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67页。

② 纪若苻、乐俊淮:《毛驴在阿富汗战争中为何受宠?》,载《中国国防报》,2014年1月21日第18版。

③ 《汉书》卷九十六《西域传》,载许嘉璐主编:《二十四史全译》(第一册),北京: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1592页。

伊犁河流域和伊塞克湖地区的占有者和塔什干的宗主,它控制了帕米尔山谷地区,成了吐火罗地区、喀布尔和克什米尔的保护者。高仙芝在库车驻地上,其行为俨然是中国在中亚的总督。然而突然间,一切都崩溃了。同样是由于这位将中国的胳膊伸到如此遥远地区的高仙芝的作用。”^①

这段评价有正反两重含义:其一是肯定唐朝西陲靖边政策因其控制了影响中国西陲安全的关键地带帕米尔高原,在逻辑上说是成功的;其二是批评唐朝合乎逻辑的西扩范围却超出国力可支持的极限,因而是力所不及的。公元741年(唐开元二十九年)的西界与西汉时大体重合,约在东经68°左右。但在公元741年至820年(唐元和十五年)间,中国西陲边界却迅速东退至约东经72°;^②至明、清,中原王朝可以直接控制的西陲边界大体维持在这条经线左右;民国时,中国西陲边界进一步东退,但收缩幅度约在1°-2°之间。这说明勒内·格鲁塞的判断是符合事实的。这个判断对今天中国西域政策的制定是有益的,即我们在赞美唐帝国治边武功的同时,也要看到它事实上为自己加上了力所不及的负担——正如俄罗斯将东境扩张至阿拉斯加的结果也给自己加上了力所不及的负担而不得不最终放弃一样。^③

事实上,控制帕米尔高原,不仅对中国,甚至对近代英国和当代苏联遑论美国,都只是符合纸面逻辑推理却不符合实践经验的力所不及的目标。总结这些帝国陷在此地均不能自拔并由此拖垮国力的教训,笔者认为,汉唐时西扩涵盖帕米尔高原的边界不应是今天——特别是在台海两岸尚未统一的历史条件下——中国人追求的范本。对于当代中国的靖边政策而言,退而求其次的可行方案就是牢牢控制位于中国境内的喀什。扼住喀什及以此为龙头的南疆线也就扼住了中国西域反分裂斗争成败的关键。

(三)从20世纪末开始,新疆恐怖分裂活动再次向喀什一线集结

不审势即宽严皆误,后来治疆要深思。^④ 总结历史大势是为了更好地认识今天。值得警惕的是,20世纪90年代始,中国境内的恐怖分裂活动出现加速向喀什一线集结的趋势。这说明在国际反华势力的资助下,新疆恐怖分离主义试图从南疆东帕米尔地区突破,既打通联系中亚的外援通道,又方便与“藏独”分子在此联手,以达到祸

① 勒内·格鲁塞著,蓝琪译:《草原帝国》,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159页。

② 参见谭其骧主编:《简明中国历史地图集》,第17-18,41-44页。

③ 1853年3月,出于力量不足以防御的考虑,俄国东西伯利亚总督穆拉维约夫向沙皇建议将阿拉斯加卖给美国,俄国应收缩过长的防御边界,集中经营黑龙江流域。参见巴尔苏科夫编著:《穆拉维约夫-阿穆尔斯基伯爵》第一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73年版,第331-332页。

④ 在此套改清人赵藩为成都武侯祠撰写的楹联:“能攻心则反侧自消,从古知兵非好战。不审势即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

乱和分裂中国西域的目的。如果了解喀什地区的上述地缘政治意义,我们就会明白表 1 中所列事件特别是 2013 年事件所发生的地点在喀什高度趋同的现象显然不是巧合。

表 1 1990 年以来新疆重大恐怖分裂事件一览表

时间	事件发生地	规模、过程、结果
1990 年 4 月 5 日	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阿克陶县巴仁乡 地理位置:帕米尔高原脚下,位于新疆阿克陶县城西南部,与喀什地区疏附县、英吉沙县、阿克陶县等接壤	“东突”骨干分子纠集约 200 人,夺取警服和枪支弹药,杀害武警战士,进而向乡政府院内投弹、射击,发起进攻,其目标是:拿下巴仁乡,然后扩大地盘,成立所谓的“东土耳其斯坦共和国”。在说服教育无效的情况下,我武警和公安干警在当地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下,发起进攻,一举平息了暴乱,迅速恢复了社会秩序和生产秩序
1992 年 2 月 5 日	乌鲁木齐 地理位置:位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中北部,天山中段北麓、准噶尔盆地南缘,西部和东部与昌吉回族自治州接壤,南部与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相邻,东南部与吐鲁番地区交界	乌鲁木齐的公共汽车、影剧院、住宅楼里被安置了四颗定时炸弹。2 路公共汽车的爆炸异常惨烈。爆炸案告破认定,这是一个叫做“东突厥伊斯兰改革党”的暴力组织所为。此次爆炸案告破于 1500 公里外的喀什。案件主要的犯罪嫌疑人事后逃到喀什,准备从昆仑山口逃向国外。1991 年 2 月 28 日,这个组织成员曾在库车县客运站录像厅制造了新疆第一起恐怖爆炸案件,造成无辜群众死 1 人,伤 13 人。此后,他们便将目标锁定乌鲁木齐,在乌鲁木齐爆炸案之后,又在新疆境内针对无辜群众制造了 15 起爆炸案
1993 年 6 月 17 日	喀什 地理位置:天山南麓,新疆西南部	喀什地区农机公司办公楼发生爆炸,两名无辜群众身亡,另有 1 人重伤、7 人轻伤
1997 年 2 月 5 日	伊宁市 地理位置:中国新疆北部伊犁河谷处	伊宁市的大街上突然冲出一伙人,手举横幅,呼喊口号,沿伊宁市主要街道游行。到了 12 时许,游行人数从一百多人增至千余人。随后,骚乱分子开始了他们的暴力行为
1997 年 2 月 25 日	乌鲁木齐	恐怖分子将炸弹安放在乌鲁木齐四个方向,选择人最集中的地方在同一时间引爆。炸弹里满满地填充着铁钉子、钢珠、螺帽、螺杆,这些东西被强烈的硝酸炸药喷射出来,威力无异于一颗颗子弹。其场面极为血腥
2008 年 8 月 4 日	喀什	新疆喀什市边防支队集体出早操行至一宾馆时,突遭 2 名作案分子驾车袭击,并引发车上的爆炸物,当场造成 16 人死亡,16 人受伤,2 名作案人员被抓获

续表 1

时间	事件发生地	规模、过程、结果
2009年7月5日	乌鲁木齐	发生打砸抢烧严重暴力犯罪事件,造成197人死亡,1700人受伤,被毁车辆达260部,其中190部公交车、50多部民用汽车;受损门面房203间、民房14间,全市共有220多处纵火点,有两栋楼房被烧毁
2012年2月28日	喀什叶城县	恐怖分子在叶城县幸福路步行街手持刀、斧疯狂砍杀无辜群众,当场致13人死亡,16人受伤,其中2人经抢救无效死亡。在事件处置过程中,1名联防队员牺牲,4名公安民警受伤
2012年7月18日	和田 地理位置:位于新疆南隅。南抵昆仑山与西藏自治区交界,北临塔克拉玛干大沙漠与阿克苏相连,东部与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相接,西部与喀什地区毗邻,西南以喀喇昆仑山为界,同克什米尔接壤	18名暴徒按照预先计划冲入和田纳尔巴格派出所,杀害1名联防队员和2名办事群众,杀伤两名无辜群众,劫持6名人质,在派出所楼顶悬挂极端宗教旗帜,纵火焚烧派出所
2013年4月23日	喀什巴楚县色力布亚镇	导致15名民警、社区工作人员被害,警方击毙了6名暴徒,并抓获8人
2013年6月26日	吐鲁番鄯善县鲁克沁镇 地理位置:位于天山东部南麓的新疆吐鲁番盆地东侧	一批持刀暴徒先后闯入当地公安局、政府大楼及建筑工地,斩伤多人,又放火焚烧警车,并与警察交火。在9名警员和保安以及8名平民当场遇难后,警方还击并击毙了10名暴徒,另有3名暴徒当场被捕
2013年8月20日	喀什叶城县	喀什警方包围了一群正在喀什地区叶城县依力克其乡偏僻地区受训的28名恐怖分子,击毙了其中的15人,一名排爆的警察牺牲
2013年11月16日	喀什巴楚县	发生暴力恐怖袭击事件,导致11人死亡
2013年12月15日	喀什疏附县	多名暴徒投掷爆炸装置并持砍刀袭击执法民警,造成2名民警牺牲,警方击毙暴徒14人
2013年12月30日	喀什莎车县	9名暴徒持砍刀袭击县公安局,投掷爆炸装置,纵火焚烧警车。公安民警果断处置,击毙8人,抓获1人。经查明,这是一起有组织、有预谋的暴力恐怖袭击案件,9名暴徒自今年8月开始陆续纠集,结成暴恐团伙

续表 1

时间	事件发生地	规模、过程、结果
2014 年 1 月 24 日	阿克苏地区新和县	公安机关在处置新和县发生的暴恐案件过程中,遭到暴徒投掷爆燃装置袭击,击毙暴徒 6 名,抓获 5 名,6 名暴徒在实施犯罪时发生自爆死亡。一名公安民警受轻伤,群众无伤亡,缴获一批爆燃装置和作案工具。警方查明,新和县“1·24”爆炸案是一起有组织、有预谋的暴力恐怖袭击案件
2014 年 2 月 14 日	阿克苏地区乌什县	恐怖分子驾驶车辆,携带爆燃装置,手持砍刀,袭击公安巡逻车辆,致 2 名群众和 2 名民警受伤,5 辆执勤车损毁。公安民警在处置过程中,击毙 8 人,抓获 1 人。3 名犯罪嫌疑人在实施犯罪时发生自爆死亡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公开资料整理。

表 1 中事件排列所展现出的路线图表明,从 1990 年 4 月 5 日发生在西南疆的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阿克陶县的带有明确分裂国家政治图谋的“巴仁乡暴乱”起,经二十多年的四处作乱,到 2013 年新疆分裂主义活动迅速再向南疆尤其是喀什一带集结;今天新疆分裂活动的特征与 19 世纪噶尔丹、张格尔、阿古柏为祸路线正在重合;如果联系到 2013 年 10 月 28 日发生在中国首都北京市中心的那起有预谋的驾车冲撞事件和 2014 年 3 月 1 日发生在云南昆明火车站的特大暴恐事件,我们就会意识到当前日益向南疆喀什一线汇集的地区分裂主义事件已不是互不联系的偶发事件,而是“经过严密策划、有组织、有预谋的暴力恐怖袭击案件”;^①若再将这二十多年的分裂恐怖案件串联起来,就不难看出其中已有鲜明且在历史上被新疆恐怖分裂势力规律性地多次重复过的地缘战略取向。

这里需要再次说明的是,本文所说的喀什地区,并不仅指喀什,而是指以喀什为重心的南疆地缘政治构架。从东汉班超收复西域、唐朝粉碎小勃律分裂活动、清政府平息噶尔丹、张格尔和阿古柏分裂叛乱等的行动路线可以看出,如果没有东北的阿克苏和东南的和田两区与喀什形成的犄角呼应,仅靠喀什一域并不足以在南疆成势。中国历代反分裂斗争经验同样表明,扼住阿克苏与和田,若不西出,喀什也就成了进退失据的绝地。明乎此,我们就理解了唐朝治疆以南疆为重,治南疆以“安西四镇”为核心环节,四镇以疏勒为龙头,西陲靖边又以控制帕米尔高原为要义的政策设计的深层考虑。

^① 《警方破获“10·28”暴力恐怖袭击案件》,http://news.xinhuanet.com/2013-10/30/c_117938784.htm, 登录时间:2013 年 10 月 30 日。

(四) 兰州：“西域咽喉在此间”

“汝果欲学诗，功夫在诗外。”^①治疆同理。前文已分析喀什在治疆中所具有的关键意义，但若进一步深究，我们又会发现，如果不能像高仙芝那样西控帕米尔高原，那么东控喀什至兰州一线尤其是其间的河西走廊，对整个新疆稳定则具有全局意义。诚如朱希祖所说：“盖汉弱匈奴，唐灭突厥，必先征定西域，巩固河湟；宋明失西域，则侵陵于辽金，灭亡于蒙满；若夫南宋南明，皆退婴南服，终至退无可退。”^②

沿着天山南北的两条丝绸之路向东经哈密、敦煌，最终合汇于河西走廊，这使河西走廊成为中原与西域经济政治联系的咽喉要地。西汉初张骞第二次出塞的成功是由于霍去病实现了对河西走廊的牢牢控制。这说明，中原对新疆失控往往从“陇右”^③开始，而从长安进入陇右的第一入口便是兰州。

唐安史之乱后，安西、北庭以及河西、陇右驻军大部内调，吐蕃乘虚占领陇右、河西诸州，安西四镇与朝廷的通道中断。尽管安西四镇仍有守军，但不久便被吐蕃相继攻陷。9世纪中叶，回鹘占据新疆天山南北，至使唐“缘边羁縻府州已大量撤废或内迁”。^④ 1877年（清光绪三年），左宗棠消灭阿古柏、收复喀什噶尔，这也是与此前成功平息陕甘回变并于1871年（清同治十年）进驻并控制甘肃的自然结果。

20世纪40年代，民国政府从军阀盛世才手中收复新疆更是先从控制河西开始的。1941年年初，盛世才为了换得苏联支持，再次“向苏联提议：新疆脱离中国，建立苏维埃共和国并加盟苏联”。^⑤ 这引起了正在全力“剿共”并对河西走廊尚无控制力的蒋介石的警觉。1941年6月苏德战争爆发为蒋介石收复新疆提供了机会。蒋介石先授权时任蒙藏委员会委员长的吴忠信劝服马步芳让政府军驻防河西走廊并于次年春派嫡系胡宗南部队进驻河西一带，由此控制了从内地通往新疆的关键通道。1944年苏德战场形势逆转，苏军在东线战场上节节胜利，这促使蒋介石下决心彻底解决盛世才在新疆的独立王国。1944年春，蒋介石将在武威新成立的第二十九集团军总司令部移到新疆哈密，并利用新疆内乱派军队进入新疆，随后又部署配有若干飞机的部队在酒泉集结待命。看到这样的部署，盛世才知道大势已去，不得不向中央政府交出新疆。

如果说山海关是北京在东北方向最后的屏障，那么兰州则是长安在西北方向的最

① [宋]陆游著，钱中联校注：《剑南诗稿校注》卷七十八，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4263页。

② 朱希祖：“序言”，载曾问吾：《中国经营西域史》，第2页。

③ “陇右”一词由陕甘界山的陇山（六盘山）而来。古人以西为右，故称陇山以西为陇右。

④ 谭其骧主编：《简明中国历史地图集·唐时期图（三）说》，北京：中国地图出版社1991年版，第43-44页。

⑤ 侯风云：《试论南京国民政府统一新疆的斗争》，载《安徽史学》，2004年第6期，第36-42页。

后屏障。河西之要在兰州。兰州位于祁连山东端,黄河穿城而过,蜿蜒百余里。清代著名学者张澍用“倚岩百丈峙雄关,西域咽喉在此间”^①的诗句形容兰州的战略地位。至于河西,明末清初地缘政治学者顾祖禹总结得更为经典:“欲保秦陇,必固河西,欲固河西,必斥西域。汉人系此,羌戎宾至如归服者二百余年。”^②

欧亚大陆可容纳的古今战略力量,大体分为欧洲、中亚和中国三部分。在古代是西东两端的欧洲罗马帝国、中亚帝国^③和中华帝国,近代俄罗斯又在北方崛起,而欧洲日益强大,中亚伊斯兰力量在欧洲、俄罗斯、中国三方的挤压下日渐式微。中世纪的欧洲、中亚、中国三种战略力量并存的格局为欧洲、俄罗斯、中国并存的格局所取代。近代以来的历史经验表明,在欧洲、俄罗斯、中国三者之间若有任何一方衰落——比如公元5世纪罗马帝国的衰落,19世纪末清王朝的衰落,20世纪上半叶欧洲的衰落及20世纪末的苏联解体——并由此造成的战略力量的收缩,都会引发中亚战略力量(主要是伊斯兰力量)在欧亚结合部即中亚地区的崛起和扩张。这样的变局一旦出现,它对中国西陲安全造成的压力当然是全方位的,而中国平息由此引发的西域动乱的着力点多集中于帕米尔高原-喀什-兰州一线。

近代以降,国防动力系统改为机械力。为了西域的稳定,兰州一直都被列入装备制造的重要基地。1873年,陕甘总督左宗棠曾设立兰州制造局,这对稳定甘肃及随后进军新疆顺利消灭为祸十年之久的阿古柏分裂主义伪政权,都提供了重要的装备支持。^④新中国在“一五”规划中就将兰州列入布局重镇,建国之初奠定国家新工业基础的156个重点项目中就有12个定址在兰州。

近年来,新疆经济文化获得大发展,但与此同时,当地分裂主义势力也在国际反华势力的怂恿和支持下死灰复燃。这警示我们莫忘历史经验,在注重打造兰州生态“环境友好型城市”的同时,切莫忽视兰州在整个大西北安全稳定中所担负的战略保障功能;在注重将新兴产业、高新技术产业和循环经济引入兰州的同时,不仅不能削弱反而要强化兰州在“三线建设”^⑤期间已形成的近可确保西北稳定、远可稳送物流西出的装

① [清]张澍:《金城关》,“倚岩百尺峙雄关,西域咽喉在此间。白马涛声喧日夜,青鸾幢影出岗峦。轮蹄不断烽烟靖,风雨常愆草木衰。回忆五泉泉味好,为寻旧日漱云弯”。

② 转引自[清]顾祖禹:《读史方輿纪要》(六),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2972页。“斥”,即开拓。

③ 中亚帝国,比如古代的波斯帝国、亚历山大帝国(笔者认为,它本质上是欧洲人建立的中亚帝国,是希腊人对波斯帝国西扩的逆推和重演,这与后来的沙俄帝国是对蒙古人西扩的逆推和重演一样)、安息、贵霜帝国、阿拉伯帝国和蒙古帝国等。

④ 参见徐中煜:《左宗棠收复新疆时的军械、军火运输》,载《西域研究》,2003年第2期,第21-26页。

⑤ 三线建设是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由毛泽东等第一代领导集体做出的一项重大战略决策,它是在当时国际局势日趋紧张的情况下,为加强战备,逐步改变中国生产力布局的一次由东向西转移的战略大调整,建设的重点在西南、西北。为保卫祖国、防止外敌入侵,打击分裂主义活动提供了坚强保障。

备生产能力。就目前的中亚形势看,强化兰州在“三线”建设时形成的装备制造能力,殊为迫切。

四 判断和预警

进入21世纪后,在中国至欧洲的陆上丝绸之路开通并带来巨大经济利益的同时,中国西陲的安全压力也将相应地增大。

(一) 中亚出现的战略真空将加大中国西陲的安全压力

美国衰落与北极解冻,是21世纪出现的具有世界意义的地缘政治变动。

美国在中亚撤军将造成中亚出现巨大而其他国家(比如中国、俄罗斯)或地区(比如欧盟)又无力迅速单独填补的战略真空,其结果必然是本土伊斯兰力量的崛起。与曾为中国安全提供绝对保障的东海在被拥有蒸汽动力和远航技术的西方人征服后所引起的中国安全“后院起火”并迫使中国国防资源向东海倾斜、中国海军由此出现的情形非常相似,北极解冻将破天荒地改变俄罗斯原有的无北顾之忧的国防结构并迫使俄罗斯国防资源向北线倾斜。

鉴于俄罗斯人口增长缓慢以及北方边境过于漫长,北线新产生的安全压力对未来的俄罗斯来说是难以承受的。这将加大俄罗斯对中国的战略合作需求,并迫使俄罗斯减少在中亚的存在;与此相应,中亚地区恐怖主义或各种宗教原教旨主义为争夺中亚战略真空对中国西陲造成的安全压力和危险必将增大。这也要求中国在中亚地区加强与俄罗斯的战略合作。

(二) 日本诱导中国西进中亚以间离中俄关系

俄罗斯在中亚的核心利益是从其通往印度洋的线路,在这条线路上的中亚地区存在着强大的伊斯兰反俄力量;鉴于中国新疆西界不在其进入印度洋的核心线路上,只要中国力量不过多地卷入中亚,俄罗斯中亚战略的重心就不是中国而是伊斯兰反俄活动。俄罗斯需要防止中亚伊斯兰势力集结形成反俄联盟,鉴于此,俄不仅不会使用其全部力量在这一地区与中国开展大规模的正面冲突,相反还会适度对中国力量西进表示欢迎,这样可以借助中国的力量遏制伊斯兰力量,以减少自己在中亚的支出。俄罗斯人明白,中国关注的重心在远东,不会过度卷入被俄视为核心利益的中亚地区事务。明乎此,我们也就明白了近代以来几乎所有的“疆独”冒险在被俄罗斯利用后即被抛弃的原因。

我们应当清醒地认识到,美国从中亚撤军后,没有俄罗斯的合作,中国不可能单独

应付在中亚新崛起的战略力量。因此,俄罗斯目前视中亚为核心利益的坚定立场对中国是有利的。中亚历来被俄罗斯纳入其通往印度洋的核心利益线,正如以台海为中心的东海是我们进入太平洋的核心利益线一样。“好邻居勤打墙,好朋友勤算账”,只有感到背后安全因而是值得依靠的朋友才能“背靠背”地团结在一起。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中亚是中俄两国必须背靠背的地方。为了东海的战略布局,中国应当对俄罗斯的中亚利益在上合组织的框架内予以特别尊重,并以此换取俄罗斯对中国在东海利益的特别尊重。我们不能只看到汉唐时代流动在丝绸之路上的巨大商贸利益,同样也要看到当时在获得巨大商业利益的同时,汉唐两朝也不得不单独承担抵制覆盖整个蒙古高原的匈奴、鲜卑、突厥势力的南犯和直逼整个西陲的大食帝国东扩的压力——这样的压力在16世纪俄国东扩后从西北逐渐移至东北。退一步说,如果今后俄罗斯真的像美国一样也从中亚抽身——这是日本右翼分子目前最希望看到的前景,那么在今天的地缘政治格局中,中国将因无力填补在中国西陲出现的巨大地缘政治真空而对俄罗斯产生“老九不能走”^①的迫切需求。

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当年德皇威廉二世曾竭力怂恿俄皇进军远东,其真正意图是将俄国的力量消耗在与日本争夺东北亚的冲突中并由此使德国在中欧获得俄国让出的地缘政治空间。日本——当然也有美国——也常用此种策略对付俄国和中国。1904年2月10日,日本向俄国宣战;同年2月27日,日本情报机关长明石元二郎接见芬兰宪法党主席卡斯特林,“明石信誓旦旦地表示要提供金钱和武器弹药。卡斯特林同意向日本提供俄国情报,并以罢工、罢课、示威游行,以至武装暴动等手段,来牵制俄国的对日军事行动”;^②1904年10月,“在明石的策划下,俄国境内所有的反对党团,除民粹党和民权党外,在巴黎召开统一战线的联合会议,会期5天。会议做出了‘各党派各显其能,以示威游行、暗杀等行动打倒政府’的决议”。^③随后俄国境内发生了全国性的政治动荡,接着便是俄国在远东海上的战败。2009年中国新疆发生具有严重暴力犯罪性质的“7·5”事件,日本外务省随后以罕见的与中国直接对抗的方式同意主张“疆独”的“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头目热比娅于当年7月28日访问日本;^④据日

① 这是京剧《智取威虎山》中的一句台词。“文化大革命”中,有人将知识分子排除在革命队伍之外,1975年5月3日,毛泽东召集在北京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谈话时,就借用这句台词,深有感触地说:“老九不能走。”参见逢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 1949—1976》(下),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742页。

② 胡平:《情报日本》,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8年版,第76页。

③ 胡平:《情报日本》,第77页。

④ 《日本外务省透露已批准热比娅赴日访问签证》,http://news.ifeng.com/mainland/special/wulumuqisaolu-an/zuixinbaodao/200907/0727_7229_1270113.shtml,登录时间:2009年7月27日。

本媒体透露,李登辉、达赖也分别于2009年9月和11月相继访日;^①2010年4月15日,日本再次向热比娅和达赖发放入境签证。^②如果将这些举动与日本同期开始酝酿的“逐步改变过去在全国各地均衡部署的方针,而把本国军事力量——自卫队集中到与中国隔海相望的冲绳等东中国海附近地区,这其中也包括中国坚持拥有主权的钓鱼岛”^③军事力量调整计划及2012年日本的“购岛”举动联系考虑,这期间的政治关联及其意图,则不能不让人与1905年的日俄关系产生联想,不能不对近现代中国的动荡与日本的亚洲战略产生联想。

目前的日本(部分地还有美国)右翼势力竭力拉拢中国各式分裂主义特别是“疆独”分子,其媒体在怂恿中国向南海冲击并由此间离中国与东盟关系失败后,^④又竭力鼓动中国“向西北去”,声称中国如“不掌握中亚代价会更高”。^⑤这无非是重复当年德皇威廉二世诱俄东进的策略,怂恿中国为了一些局部利益与俄罗斯的核心利益冲突并由此间离中俄关系,这样中国就不得不放弃对目前中国最为重要的东海的利益并由此减轻日本在此的压力。日本有文章声称:“当然,在西面和南面扩张影响力的同时,中国仍在向东面海洋拓展。这样做不完全是出于能源需求,北京的战略取决于诸多地缘政治和战略因素,包括美俄印的意图。指望中国放弃成为海洋强国的目标是不现实的。更合理的希望是,一旦通过西进取得新的能源安全,北京在东面会采取略微放松的姿态。”^⑥

美国哈得孙研究所高级研究员理查德·韦茨(Richard Weitz)在《北京为2014年的阿富汗做准备》一文中认为中国无法在阿富汗继续“低调”:“目前为止,对于美国在打击阿富汗和中亚伊斯兰叛乱分子方面扮演重要角色以及美国支持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北京一直采取容忍态度,认为美国的这些做法有利于实现这些目标,可以接受。但由于美国在该地区的军事和经济实力下降,北京需要改变自己的考量。中国决策者

① 《日本接连邀访中国分裂分子,大失水准》,http://world.people.com.cn/GB/9785078.html,登录时间:2014年2月19日。

② 《日政府将向热比娅和达赖发放签证》,http://world.people.com.cn/GB/1029/42354/11380297.html,登录时间:2010年4月15日。

③ 《日本防御重心将向中国转移拟在钓鱼岛部署自卫队》,http://world.huanqiu.com/roll/2010-07/962557.html,登录时间:2010年7月27日。

④ 《中方:日本炒作所谓南海防空识别区居心叵测》,http://world.huanqiu.com/regions/2014-02/4805846.html,登录时间:2014年2月2日。

⑤ 《日媒建议中国向西北去不掌握中亚代价会更高》,载《环球时报》,http://mil.huanqiu.com/paper/2013-12/4650390.html,登录时间:2013年12月11日。

⑥ 转引自《日媒:中国推动西进战略寻求新的能源供应线》,http://mil.huanqiu.com/paper/2014-01/4763734.html,登录时间:2014年1月17日。

当然希望在阿富汗保持低调,但这样的选项正在消失。中国分析人士认识到,中国、巴基斯坦及其中亚邻国将会更容易受到在欧亚大陆活动的恐怖组织的困扰,因为这些恐怖组织试图颠覆对华友好的中亚国家政府,并支持维吾尔族好战分子。新疆的经济发展与阿富汗和中亚的经济和安全环境密切相关。”^①

“将欲歛之,必固张之”,^②以对中国西陲极具战略意义的帕米尔高原为诱饵,诱使中国在国际事务中扛起中国扛不起从而可能造成东线防务失衡的外交包袱;“将欲取之,必固与之”,^③用“西进”的提法诱导中俄关系在中亚出现裂痕,使中国无暇而俄罗斯又无意东顾,造成中国东海出现“薄弱环节”并使日本在对中国的博弈中再现1905年那样的“辉煌”。此等招数对中国——当然对俄国也是一样——极为阴毒,如不看穿,对中国和俄国的未来将是灾难性的。

(三) 警惕“铁路陆权论”的历史回潮

俾斯麦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写道:“社会舆论通常只有回顾整整人类一代的历史,才能了解在对外政策中所犯的错误的,而 Achivi qui plectuntur(应当得到报应的希腊人)不总是错误举动的直接的同时代人。政策的任务就在于尽可能正确地预见到别人在现成的状况下会做些什么。这种远见的能力,很少是生来就能达到这种程度,以至不需要相当的实际经验和个人知识,就能发挥作用。”^④俾斯麦的这句话是说给德皇威廉二世治下的德国人听的,但对百年后的中国人也有借鉴意义。

今天我们有些认识似乎再次进入历史的轮回。有些学者提出雄心勃勃的以交通打通和经营周边的所谓“国际大通道”构想,有些文章谈跨境事务就像在谈国内事务,大有一种舍我其谁的态度,其口气很有些像百年前与俾斯麦稳健外交分道扬镳的德皇威廉二世。^⑤更有学者推动这样的认识即认为高铁可迅速加强中国的“陆权”以弥补海权的不足,美国杜克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日本东京大学、明治大学客座教授高柏在《高铁与中国21世纪大战略》一书中坚信:高铁可以推动欧亚大陆的经济整合,当中国高铁技术突飞猛进的发展开始颠覆人们关于空间和距离的观念时,陆权时代的回归变成一种现实可能性,而陆权时代的回归将凸显中国的地缘战略优势。既然中国紧靠世界岛中枢(即中东地区——笔者注),它可以靠推动欧亚大陆经济整合建立陆权。

① 《美专家:中国无法在阿富汗继续“低调”》,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4-01/20/c_119037423.htm,登录时间:2014年1月20日。

② 《老子》第三十六章。

③ 《老子》第三十六章。

④ 奥托·冯·俾斯麦著,杨德友、同鸿印等译:《思考与回忆——俾斯麦回忆录》第三卷,北京: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127页。

⑤ 胡鞍钢、温军、王志:《西南国际大通道建设与贸易自由化》,载《中国软科学》,2001年第6期,第5-9页。

以中国目前具备的资本与制造业的优势,这种整合将使中国经济受益无穷。这种陆权地缘经济将会化解中国在海权地缘政治上面临的压力。利用建设高铁来推动欧亚大陆经济整合将帮助中国利用其独特的地理优势建立一个与环太平洋经济整合的对冲,这将使中国在国际政治经济的大格局中处于十分有利的战略地位。中国在欧亚大陆高铁制式的制定、跨国高铁管理体制的建立和欧亚大陆经济整合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确立自己在未来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中的地位。陆权时代欧亚大陆高铁管理体制的重要性类似于世界上的海洋法,制定这个管理体制就是在为未来的国际经济秩序制定新的游戏规则。^①高柏乐观地预言:“一条贯通欧亚大陆的高铁带来的将不仅仅是古代丝绸之路的复兴,它也将使伊朗、土耳其甚至埃及这样的在历史上曾经有过辉煌的古代文明大国有机会再现当年的繁荣。”^②

但是,有点历史经验并能由此“正确地预见到别人在现成的状况下会做些什么的”人都会明白,跨境物流关系的后面并不是简单的物与物的关系,而是复杂的人与人、国与国的关系,这是马克思《资本论》告诉我们的基本道理,地缘政治后面自然也是人缘政治。国际陆运与海运不同,前者经过的是一个一个主权国家,后者则是一望无际的公海。经过主权国即使做白送这样的好事也要与人家商量,^③而后者则较少有这方面的顾虑。^④

殷鉴不远,19世纪末,大陆国家尤其是欧亚大陆最大的陆权国家沙皇俄国都曾热衷于以铁路强化其陆权扩张并由此弥补其海权不足的理论 and 实践。俄国加快修建西伯利亚大铁路并使清政府同意俄国修经中国东北境内东进太平洋的铁路。为了共同对付日本在东北亚的扩张,1896年(清光绪二十二年),清政府特使李鸿章赴俄与沙俄达成有关在中国境内修建“东清铁路”的协议。陆权论的开山人物麦金德看出了这条铁路的地缘政治意义,他不无羡慕地说:“俄国的铁路从西端维尔巴伦(Wirballen)到东端符拉迪沃斯托克,整整长达6000英里。正如过去英国在南非的驻军证明它是海上强国一样,俄国目前在满洲的军队也证明它是机动的陆上强国。诚然,横贯西伯利亚的铁路仍然是一条单一的和不安的交通线,但是在本世纪结束以前,整个亚洲将会布满铁路。”^⑤

① 高柏等:《高铁与中国21世纪大战略》,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第7-17页。

② 高柏等:《高铁与中国21世纪大战略》,第9页。

③ “做好事也要商量着做。”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二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81页。

④ 关于高铁陆权说对中国的影响,可参见吴征宇:《向“陆”还是向“洋”?——对〈高铁与中国21世纪大战略〉的再思考》,载《二十一世纪》,2013年2月号,第105-113页。

⑤ 哈·麦金德著,林尔蔚、陈江译:《历史的地理枢纽》,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67页。

事后的结果让当时那些热捧以铁路扩张陆权理论的人感到尴尬：东清铁路修成后，中俄关系严重恶化。这里的悖论是，修铁路就得管铁路，跨国管理境外资产特别是巨额资产，如无自卫能力，基本就是空谈。但若有自卫能力，那么“经济整合”就必然要转化为“政治整合（其实就是干预）”，共管必然转化为主管。当年在东清铁路上，俄国人没有逃脱这一悖论：为了维护这条铁路的管理权，俄国与中国产生的纠葛竟持续了半个世纪。1952年年底，临终前的斯大林算是看明白了这个道理，为了改善与中国的关系，他将铁路完全移交中国。

无独有偶，1888年，德国从土耳其取得建造由博斯普鲁斯海峡至安卡拉铁路的租让权，并成立德国小亚细亚公司从事修建工作。1889年，该公司根据德皇指示，于1893年1月又从土耳其取得延展铁路至科尼亚的租让权。尽管遭到英法列强的激烈反对，这条铁路还是于1896年建成。但德国并未就此止步：1903年，德国又获得从科尼亚向前延展经巴格达至波斯湾的修建铁路租让权。令德国人没有想到的是，这条被称为“巴格达铁路”的工程严重恶化了德英关系，最终竟成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重要诱因。

当然，我们说这些并不是不要通过境外贸易促进对外开放，而是要实事求是和极为谨慎地对待高铁跨境及所谓地区“经济整合”问题。“君子慎始，差若毫厘，缪以千里。”^①当年俄国在东清铁路上也是以“经济整合”为开始，但最终却演化为政治整合并由此导致中俄关系在相当一段时期出现不信任甚至恶化。只要看看俄国人用了上百年的时间整合并使之加入苏联的中亚诸国在20世纪90年代初瞬间就与俄罗斯分离迄今的事实，我们就会知道，中国目前在周边只有进行地区合作的能力，而没有进行地区整合的能力。

但是国际合作尤其是在“中间地带”^②的国际合作，也要走“群众路线”，它不应当只是单方面发出的“邀请”，而应当是在双边或多边共同倡议并在公约规则中平等参与的行为。这样的合作尽管缓慢且曲折得多，但做起来比较踏实，也比较实际。

（四）中国近似“大满贯”式的海外贸易赢利已近极限

办事之难，难在事后人际关系的消化而不是战果的获得。不难预料，这些被命名为各式“大陆桥”、“国际大通道”的跨境铁路及其物流一旦成势，我们面临的真正困难也就真正开始。历史上的丝绸之路何尝不是磨合乃至冲突之路。看看1998年的“印

^① 陈戌国撰：《四书五经校注本·礼记·经解》，长沙：岳麓书社2006年版，第668页。

^② 毛泽东：《关于中间地带、和平共处以及中英中美关系问题》（1954年8月24日），载《毛泽东外交文选》，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第159-160页。

尼排华事件”以及中国曾在伊拉克、利比亚、南苏丹和乌克兰的一些投资项目乃至刚与泰国达成“大米换高铁”的计划可能或已经搁浅的结局,^①我们就会明了,没有以相当的自卫手段为依托的经济“红利”,其增长是有极限因而是不可持续甚至还会发生逆转的。

那么中国国际贸易增长的极限何在呢?我们知道,生意也是政治的继续。一国外贸的国际份额是其在世界中所占据的政治份额决定的,而中国能在大国“中间地带”获得广大市场的主要原因并不完全由于中国产品的物美价廉,而更多的是由于这些处于中间地带的发展中国家对中国政治的需要。它们需要中国因素以打破欧美的控制,出于同样的理由,这些国家也不会完全排斥欧美并以此获得政治平衡。这样的哲学考虑在客观上规定了中国国际贸易增长的极限和底线。至于两者即极限和底线之间的空间容量,不完全取决于中国商品质量、价格等经济因素,而主要取决于这些国家对中国的政治需求程度。毛泽东明白这个道理,1956年2月10日,他在会见泰国友人时说:“美国提出了口号,要反共、反中国,在这里造了一道墙,^②但实际上是为了控制墙南各国,损害这些国家的利益,使得各国的大米、橡胶卖不出去。亚洲各国可以相互帮助,泰国的大米、橡胶可以在亚洲找到市场,我们愿意同你们进行贸易。”^③毛泽东从政治上楔入和开拓中国外贸空间的思路在今天仍需我们认真领会和深入学习。

西方人更懂得“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④的道理,国际垄断资本在世界其他地区屡试不爽后转用于对付中国的“茉莉花”式的“武器的批判”,目前看已近乎失败,那么剩下的可能选择如果不是“批判的武器”,又可能是什么呢?历史上,市场经济活动也不是请客吃饭,更不是绘画绣花,市场历来是与政治暴力相伴而行的文明形式,而文明与野蛮只有一步之遥:当你钱赚得势不可当的时候,野蛮就会接踵而至。

今天的中国人对其近似“大满贯”式的海外赢利有些突如其来的惊喜。否极泰来,然泰极亦可生否,天下既没有一直吃亏也没有一赚到底的买卖。2002年的伊拉克战争、2011年的利比亚内战,再到今天南苏丹动荡时中资企业大批撤回及中泰“大米

① 参见《中国取消进口120万吨泰国大米或影响“大米换高铁”计划》,http://www.guancha.cn/economy/2014_02_05_203926.shtml,登录时间:2014年2月5日。

② “墙”,在这里指1954年9月,在美国策动下,由美国、英国、法国、澳大利亚、新西兰、菲律宾、泰国和巴基斯坦八国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签订的《东南亚集体防务条约》(又称《马尼拉条约》),1955年生效时,成立了东南亚条约组织,总部设在泰国首都曼谷。1977年6月,该组织解散。

③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二卷,第525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9页。

换高铁”计划搁浅的事实预示,中国软实力在国际市场开拓中的有效性——如无硬实力迅速弥补——已近极限,由此引起的带有强力乃至暴力色彩的政治反弹以及中国海外市场份额巨大收缩已“风起于青蘋之末”。^① 对此,特别是对中国有能力保障的国际市场范围我们应有客观的评估并将我们以外向市场为导向的经济发展模式,及时调整到“要靠实体经济,不能泡沫化。自力更生任何时候都不能少,我们自己的饭碗主要要装自己生产的粮食”^②的思路上来。

大国崛起于地区性守成,消失于世界性扩张。事实上,目前中国有能力保障且可持续开拓的国际市场范围基本不出亚洲。至于亚洲之外的利益,我们要学会在全球利益平衡和交换中保持其稳定性增长。可以肯定,随着中国国力的增加,中国与其他国家进行全球利益平衡和交换的筹码将会越来越多。

五 东海是当前中国安全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

在西陆和东海两个方面,中国同期只能在一面取得突破且不能走得太远,这是中国历代尤其是汉朝、唐朝特别是清朝治边的有效经验,这方面矛盾处理得比较好的是新中国外交。

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面临东部需要解放台湾、西部需要解决藏疆问题的双向任务。1950年6月6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七届三中全会上向全党作了题为《不要四面出击》的讲话,他强调:“我们不要四面出击,全国紧张,很不好。我们绝不可树敌太多,必须在一个方面有所让步,有所缓和,集中力量向另一方面进攻。”^③

当时美国明确帮助蒋介石集团并且介入朝鲜和越南的南北内战,对此,中国选择了以基本建设为牵引的依陆向海、在雅尔塔框架中联苏抗美的策略;20世纪70年代初,苏联对中国北方的安全压力日增,苏联入侵阿富汗后,中国又果断地做出以改革开放为牵引的依海向陆、在雅尔塔框架中联美抗苏的策略选择。为此毛泽东与尼克松握手,这为邓小平时期的中美建交做了很好的铺垫。

当代中国在改革开放中已获得了快速发展,海外利益已成为拉动中国经济的重要动力,而两岸统一尚未完成,日本右翼势力又急速膨胀、其突破宪法第九条非战条款的危险在即。这使历史又回到类似中国五六十年代的安全形势之中,东急西重又

① [战国]宋玉:《风赋》,“夫风生于地,起于青蘋之末”。

② 《习近平:饭碗主要要装自己生产的粮食》,http://www.zj.xinhuanet.com/newscenter/rb/2013-07/22/c_116633018.htm,登录时间:2013年7月22日。

③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24页。

成了目前中国安全环境的主要特点:①在东部地区,台海两岸尚未统一而日本右翼势力又在新世纪迅速膨胀;在西部地区,美国在阿富汗战争中受到重创并被迫撤出,这将在中亚留下战略真空并引发新的战略力量的崛起,并对中国西陲产生新的安全压力。笔者在此再次强调,如果此时俄罗斯再从这里抽身,那么这种压力在东海问题日增的当下,对中国而言就是不可承受的。在东西两向的安全压力下,毛泽东在20世纪50年代提出的“不要四面出击”的策略对我们认识今天的安全形势及解决方法仍是有效的。不言而喻,中国也必须再次做出相应的依陆向海的策略调整。

如果说中国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安全问题是生存问题,那么80年代之后中国的安全问题就是发展问题。发展安全是这一时期中国安全哲学的核心概念,②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一时期的发展问题就是生存问题。中国西域是中国整个发展的托底和大后方,但“一百多年来,帝国主义侵略我们都是从海上来的,不要忘记这一历史教训”。③今天以台海统一为总牵引的东海安全已成为中国发展必须突破的瓶颈所在,这使东海再次成为中国安全问题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我们只有认识和抓住这个主要矛盾及其主要方面,才能全盘统筹,确保中国未来发展在根本问题上不出现“颠覆性”的错误,④为中国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打下稳定的国基。

[收稿日期:2013-01-06]

[修回日期:2013-02-20]

[责任编辑:主父笑飞]

① 参见张文木:《中国新世纪安全战略》,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9页。

② 张文木:《中国国家安全哲学》,载《战略与管理》,2000年第1期,第24-32页。

③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二卷,第38页。

④ 2013年10月7日,习近平在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工商领导人峰会上的演讲中指出:“中国是一个大国,决不能在根本性问题上出现颠覆性错误,一旦出现就无法挽回、无法弥补。”参见《习近平:根本问题上不能出现颠覆性错误》,http://www.chinanews.com/gn/2013/10-08/5347578.shtml,登录时间:2013年10月8日。